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 134 期 (总第 384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12 年 8 月 15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8961988622

编者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每个人都有走进夕阳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你是否想过，你怎样养老？你如何老有所归？老有所养？你真的能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吗？

自 1999 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空巢老人数量持续增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78 亿，占总人口的 13.26%，比 2000 年上升 2.93 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空巢家庭及两代老人共同居住的类空巢家庭，约占老年家庭总数的 50% 左右、达 9000 万人，且空巢化趋势日益凸显，呈现出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的特点。

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的关于养老金缺口和延迟退休的话题引来社会广泛关注。难怪，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谁都有退休的那一天，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我国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和制度很不完善，养老体系普遍存在投入不足、设施较少、服务不够多样、运营效益低、专业人员匮乏的问题。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给女儿的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准备，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不会让我们成为你们经济上的负担。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担心你们不孝顺而是太爱你们，太在乎我们会成为你们的负担……”如今做父母的不愿“啃少”，让人动容。

本刊特此推出《养老》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推荐的文章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要目

●本期专题/养老

你还可以这样养老

“以房养老”面临五大难题

1000 老人仅 17 张床位 养老产业亟待提速

“入狱养老”，触痛社会保障底线

外国人如何养老

- 国是论衡/中国患上苏联病 必须对此有高度警觉
- 政坛经纬/纽约时报：解读中国省级党委换届
- 人物春秋/被故乡“吃掉”的沈从文
- 历史深处/康乾盛世”时一个谣言如何引发国家级事件
- 本期专题/养老

你还可以这样养老

【主持人】忻之湄

【嘉宾】

朱伟珏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齐科长 某公办养老院业务主管

徐 超 上海海阳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的话

根据近年的一项统计表明，上海没有子女陪伴在身边的老年人总数达 94 万余人，从 2013 年起，上海新增老年人口中八成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如何养老，不可避免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本期谈话邀请了社会学家、养老机构主管和养老事业经理人一起来谈谈：你还可以这样养老——

坦然接受来自亲人的照顾和各种公共服务，享受有尊严的晚年。

主持人：目前国内一般有些什么样的养老模式？对于选择进入养老院，不少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无可奈何的最后一遭，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伟珏：中国社会居家养老率高达 97%（90%为家庭养老，7%为社区养老）。而随着独生子女及核心家庭的大量涌现，家庭养老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今后，包括养老院在内的机构养老模式（目前仅占 3%）将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选择。与中国不同，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主义。

子女较少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而且老年人比较自立，不太愿意麻烦和依赖子女。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度过自立和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十分重要。所以国外许多老人愿意独立生活，如果体力状况不允许，则大多会选择进养老院或老人公寓，而不会将此看作是被亲人或社会的遗弃。我曾常年旅居日本。在日本，机构养老(包括养老院和老人公寓等)是一种较为普遍也得到老年人认同的养老模式。日本老人具有较强独立性，不喜欢依赖子女。在他们看来，进养老机构接受公共服务体现了个人的尊严。由于日本是较早步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所以各种老年设施完备，能基本满足多层次人群的需求。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利用已经关闭的幼儿园、中小学校舍(日本因少子化不得不关闭很多学校)改建的养老院。这些养老设施因紧邻社区而深受欢迎，既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也使得老人们可以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主持人：所谓“养儿防老”在今日社会还靠得住吗？

朱伟珏：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早已解体，由父母和独生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成为主流。随着成年子女的离去，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社会养老将成为今后主要的养老模式。为了适应这一变化，有必要树立一种全新的养老观念。在这方面，西方发达社会强调自立性、有尊严和有意义晚年生活的养老观念可以作为有益的参考。

事实上，我周边有许多上海老人都很自立。他们有尊严地安享着晚年生活。由于有退休金，这些老人经济上不用依靠子女，即便在生活方面也不愿意麻烦子女，尽量自己克服。以我旅居过的日本为例，日本人普遍认为养老问题应该由政府和自己共同解决。在养老问题上，子女承担的责任向来较少，除了人人都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外，很多人还会购买各种商业养老保险。我认识一位大学女教师，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养老，每月要支付 13 万日元(约合 1 万人民币)的商业养老保险金。

就我个人而言，我也会尽早开始自己的养老规划。目前阶段来讲，主要做些财务规划，不过我们国家为养老准备的理财产品太少，无法满足需求。至于将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接受公共养老服务，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可以接受社区养老，如果体力不允许的话，则可以在养老院或老人公寓安度晚年。

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生活，需要社会、老人和子女共同配合

主持人：老人被送进养老院养老，子女总会被认为是不孝，你觉得呢？

齐科长：我进入养老这个行业近 10 年了。记得刚入行的那几年，子女送老人来养老院的确会有精神包袱，生怕被指责不孝，而老人心里也会有疙瘩，总觉自己好像被遗弃了。但近

年来我发现情况在变化。有些子女觉得能把家里的老人送进像我们这样条件比较好的养老院，显示了自己有实力有人脉，觉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以我所在的养老院为例，我们有 500 多个床位，在中心城区的养老院中是比较难得的。护理人员的配备、各项设施的落实是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的指标配置的。我们目前入住的老人中有 3 位百岁老人，90 岁以上的老人 92 位，还有三分之二失智失能的老者。这样的老人如果居家养老，子女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也有些家庭给独居老人找保姆，结果，不少保姆反仆为主成为家庭的主导，给老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担忧和麻烦。

主持人：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养老院的不良新闻，还有种说法送老人去养老院等于给老人折寿，情况真是这样吗？

齐科长：我觉得在这方面媒体的报道有误。据我的观察，真实的情况真的并非如此。我也考察过不少民营的养老院，平心而论，为了生存需要，它必须得计算成本，在硬件配置上很难达标。护理人员配备不足，有些时候的确力不从心很难顾得过来。但同医护人员一样，我想，大部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出发点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好的。看了那些负面报道，作为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觉得挺委屈的。我们做过统计，在我们这里养老的失智失能老人平均寿命延长了 3-5 年呢。要让老人安心在养老院享受人生需要社会、老人和子女共同的配合。比如，选择进我们养老院的，我就会事先同家属沟通，让他们在正式决定之前，先带老人过来了解一些情况，熟悉一下环境。送老人入住以后，尤其是头一个月，要经常来看看他们，要给他一个过渡，不要让老人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般，一个月之后，老人就会渐渐适应并且喜欢上我们这里的生活。至于有个别送进养老院提早离世的老人，在我看来，最大一部分原因是事前没做好老人的工作，家属不配合，送进来就不管不顾，老人心里落差大，导致提早离开。说实话，现在收老人，我会嘱咐工作人员多了解一下家属的情况，如果家属一开始就表现得很难缠，我会建议暂时不收。我这样做其实也有不得已的原因，有些家属平时根本不看自己的父母，一旦出了事情就立刻来兴师问罪。我以前是学医的，我们对老人的主张是能坐着就不要躺着，能站着就不要坐着，我们会每天带他们活动，做保健操手指操。但毕竟是行动不方便的老人，百密一疏，难免会出一点差错，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老人家属的理解。

主持人：老人在养老院一天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你们养老院的收费一般老人能承受吗？

齐科长：我们严格按照行业协会要求配备软件硬件的。对于那些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的护理人员要定时巡视、给他们翻身。对于行动自由的老人，这里的生活内容很丰富，有 15 门老年大学的科目，老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上。定期有志愿者来陪老人唱歌、做操、说话。一般六人间的话，每月花费 2500 元。双人间的话，收费会贵一些。

科技手段可以解决老人的生活问题，精神需求需要亲人的呵护

主持人：您从事老年事业多年，觉得什么样的养老方式是目前比较可行的？

徐超：我做过统计，在中国社会，80%的老人不喜欢离开家去养老院。即便选择养老院，大部分老人也不喜欢到偏远的郊外，哪怕那里的硬件设施好空气好。现实情况是，中心城区的养老院很少。建立一个养老院必须符合很多相关标准，这些标准在中心城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这就造成了中心城区养老院一床难求，而远郊有不少设施不错的养老院空置。我听说过老人申请养老院一个床位，排队要排10年！我考察过不少国外的养老院，在欧洲、日本，社区如果有五六个床位就可以设一个养老院。但在国内目前显然还不太可行。从国情出发，对于中国的老人来说还是居家养老让老人觉得安心而又自尊。但目前的问题是，子女通常比较忙碌，很少抽得出时间来探望老人，他们容易陷入孤独、寂寞和精神危机中。

主持人：你所在的区域推出的社区养老服务很受老人欢迎，这是一项怎么样的服务呢？

徐超：我始终觉得“关心老人的今天就是关心我们的明天”。我所在的区是全国首批养老服务示范区，我们有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信息化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平台”，实现了全区养老服务的全覆盖，这个平台也算是国内首例。我们现在推出的养老服务就是在老人家中装上一个客户终端，老人有需要，可以通过这个终端联系我们的养老中心。老人们可以用“一键通”电话或手机，拨打我们的热线，预约个性化服务。比如，如果老人感到身体不适或发生紧急情况，只要按下特定的一个键就能接通中心平台，平台电脑屏幕上会同步跳出按键人住址等各种信息，工作人员可马上通知救助员赶赴现场，有紧急情况还可以通过信息直接通知老人的子女。当老人需要陪医取药、助浴洗涤、送餐购物、理发做饭等服务时，可用“一键通”向中心平台预约项目和时间，上门的助老服务员随身带着POS机，老人可用服务卡结算费用。有时候，老人拿着电话和我们的助老服务员能说上一个多小时，这样的情形让我感到既欣慰又心酸。目前全市有4个区域已经有我们的服务了。

不过，我觉得无论养老业怎么发达，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就我们个人而言，还是应该多花点时间关心老人。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手段解决居家养老的实际问题，老人的精神生活还是需要子女的关注与呵护。

虽然大多数老人没有雄厚的经济能力，但他们有个共同心愿：宁愿让孩子“啃老”，也不愿意自己“啃少”。父母的爱心令人动容，如果每一个子女能够用心去关心自己的父母，如果今天的我们能够早早规划，做一点物质上精神上的准备，如果相关部门能够制定更合理的政策，让养老院、社区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更合理地铺展，享受美好的老年生活应该不是一种奢望。（2012-08-05 新民晚报 朱伟珏）

广东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会在广州成立

8月12日，经省民间社团组织管理局核准，广东省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会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发来贺信。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原空军副政委徐承栋中将、原广州军区副政委王同琢中将、省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罗东凯被聘为名誉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被聘为名誉会长和医学专家委员会主任。

据悉，我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243万。广东省养老服务产业促进会是全国首家致力于养老产业发展的民间组织。该会正准备开展一系列服务于老年人的项目工作，具体包括都市型养老公寓项目，年度世界性的老年健康用品、产品博览会，养老介护教学培训班项目，关爱空巢老人项目等。（2012-08-13 南方日报 黄少宏 实习生/蒲美辰）

“以房养老”面临五大难题

近期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养老产业与养老地产高端论坛”上，众多地产商及保险公司纷纷表示出了对养老地产的高度兴趣。而业内人士指出，养老地产项目的陆续启动，也意味着我国推行“以房养老”又近了一步。

也就在上月初，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会上明确提出，要将“以房养老”纳入到下一阶段工作的引导方向。那么，“以房养老”距离我们还有多远？与三年前相比，还面临着哪些瓶颈？

“以房养老”呼声越来越高

“年轻时贷款买房，到60岁临近退休时把房贷还清，然后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或保险公司等机构，这些机构根据房屋的估价每月支付给老人一定费用，使其晚年衣食无忧，直至终老。”这就是“以房养老”所描绘的生活。因这种养老方式是把住房抵押贷款反过来做，因此也称“反向住房抵押贷款”或“倒按揭”。

一般来说，晚年养老资源不外乎儿女、金钱和房子三种。而时下，单靠社会养老金已很难满足老人退休后的高质量生活，“421”家庭结构下单靠儿女赡养也越来越不现实，因此，“用房产担当养老重任，部分取代养儿防老和货币养老，意义重大且积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柴效武表示。

目前，国家政策方面的风向已渐趋明朗。上月，在全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会上，窦玉沛明确指出，“以房养老”将纳入到下一阶段工作的引导方向。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虞国柱也指出，与三年前上海试行“以房养老”时的社会环境相比，如今已大为不同。曾经最为掣肘“以房养老”的“养儿防老”和“有房传子”的传统观念，随着“40后”子女向“80后”子女的转变已逐渐淡化。

不过，在我国，真正的“以房养老”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2007年，上海公积金管理中心试水“住房自助养老”，与反向住房抵押贷款不同的是，其一开始就变更了房屋产权人，结果报名者没超过10人，最后不了了之。同年，北京也开展了“养老房屋银行”的实践，该项目由养老服务中心与房产中介公司合作。不久，该实践也被迫夭折。据悉，原因是服务中心不能保证中介按时给付房租，而老人担心无法收到房租。

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也没有相应的“以房养老”业务和产品。三年前，有消息称，幸福人寿将成为我国首个开展“以房养老”试点业务的保险公司，然而其获批成立后，这类产品却迟迟没有动静。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产品目前仍在研发中，何时推出还不好说。

近日，记者询问了几大银行个贷部的相关人士，他们均表示目前没有与“以房养老”相关的贷款业务。农行北分在2006年曾被指欲推出“倒按揭”，但至今未见任何实质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时下，“曲线”以房养老，如租房养老、以大换小等形式却在很多城市悄然流行。

幸福人寿董事长、中房集团理事长孟晓苏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仍然看好“以房养老”这块市场。虽然传统的养老观念目前仍然尚未完全改观，但现在有的老人有多套房，还有很多老人属于没有子女的“丁克家庭”，他们愿意“以房养老”。

他指出，此种养老方式在具体操作上非常灵活，可细分为近40种方式，如老人可以搭配高额的医疗保险，可以要求保险公司以递减、递增或者均衡的方式给付养老金等。

从事多年“以房养老”课题研究的柴效武也认为，目前，国内各方机构对于运营“倒按揭”的思路基本已经成型，公认产品定价应与抵押住房价值的高低、老人预期寿命的长短和利率费率的高低相关。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来说，‘以房养老’的‘月收入’应该是可观的”，据孟晓苏的初步推算，在北京拥有一套价值300万-400万元房产的65岁男性老人，预期寿命为77岁，如果通过“倒按揭”以房养老，其每个月从保险公司拿到的养老金可达到2万元。

推广遭遇多重障碍

难题一：养老观念陈旧

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养儿防老”的观念已逐渐淡化，但“但存方寸地，留于子孙耕”的传统观念却一直影响着这一代老人。将自己居住多年的房产抵押，不留给子女，这样的现实，他们一下还难以接受。

记者对周围几位老人调查发现，大多数老人表示无法接受“以房养老”，在他们看来，房子是要留给子女的。虽然目前退休金不多，但紧紧还够用，即使在以后生活中需要儿女补助一些，但维持日常生活也不需要太多，而房子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对儿女以后生活有帮助。

此外，还存在一个客观因素，目前，我国没有开征遗产税，这也在间接上鼓励子女继承遗产，反对老人“以房养老”。

难题二：养老机构不完善

庾国柱表示，目前，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房子到养老机构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的养老机构不够完善，缺少家的感觉。

家住三元里的独居老人程老太今年 72 岁，曾经也想过到养老公寓养老，但是到那里只住了半个月就搬了回来。她说：“跟住宾馆似的，不像家。”

养老机构建设不完善是一个现实问题。据窦玉沛提供的数字，现在，我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全国老年人口的 1.59%。

“好点的养老机构收费较高，一般家庭付不起；差点的机构服务又不到位”，庾国柱指出，保险公司投资建设养老社区将是未来寿险发展的一大趋势。目前，泰康人寿投资的保险业首个养老社区已进入实施阶段，合众人寿也提出了投资 20 亿元建设养老社区。

此外，万科、首创、保利、华润等地产公司也加入养老地产建设中，均成立了专门的研发团队。上月中旬，河北省常务副省长赵勇也曾多次表示，该省环北京的 13 个县将分别建设养老基地，以吸引北京有房老人“以房养老”。

难题三：金融机构犹豫不决

据记者了解，“以房养老”金融产品推出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金融机构的犹豫，房价下跌的风险是他们最为担心的因素。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承接“倒按揭”的业务尚不成熟，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中长期走势、人均预期寿命等关键因素难以预测。对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来说，正向按揭贷款的风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小的，而“倒按揭”恰恰相反，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如何确定“倒按揭”利率也是一大难题，贷款额少，老人不乐意；贷款期长，机构又可能吃亏。

农行个贷部一位姓韩的负责人表示，虽然“倒按揭”很可能成为银行盈利的新品种，但如果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扶持，减轻风险，“以房养老”很难大范围推广。“倒按揭”

的评估标准非常复杂，除了估算房屋价值及未来房价走势，还要估算老人寿命，同时，银行还要培育一批类似保险精算人的测算人群，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两年内能解决的。

难题四：受 70 年产权限制

我国推行“以房养老”还面临一个特殊的国情，即我国住宅用地的使用年限一般只有 70 年，这也是保险公司和银行等机构普遍担忧的问题。因为，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未获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将由国家无偿收回。

业内人士指出，当老人年迈将房产抵押时，商品房的使用年限大都已经不多，而当老人身故时，使用年限更是所剩无几。那么，保险公司或银行依靠剩下的使用年限来补偿已支付的养老金成本，一方面所能承受的给付能力有限，另一方面风险也较大。保险公司或银行将房产收回后无非出租或出售以获得相对稳定的现金流，但在房价泡沫时，租不出去或卖不上价的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

不过，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随着物权法的出台，这方面的障碍已经消除。

难题五：适用人群较小

“以房养老”的前提是手里有房。首先，拥有房屋产权；其次，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第三，老人的经济状况适中。

一般来说，手头有两套以上房产的人可能更会考虑“以房养老”。而从观念接受程度上，时下的中青年更易接受，他们应该是未来“以房养老”的潜在群体。但近年来房价非理性上涨已经大大超出了很多人的承受能力，目前在北京买套差不多的房子也要 100 万元左右，如果现在人到中年，即使不吃不喝到 60 岁也还不上贷款，60 岁之后人养房都成问题，更别说房养人了。

国外 62 岁以上老人通过“倒按揭”养老

美国：已有 20 多年的经验。发放对象为 62 岁以上的老年人，放贷原则为住房资产越高则可贷款数额越高；预期住房价值的增值越高可贷款数额越高；年纪大的住户可贷款数额高；夫妻健在住户比单身者可贷款数额低。

加拿大：超过 62 岁的老人可将居住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数额在 1.5 万-30 万加元之间，只要你不搬家、不卖房，房产主权不变，可以一直住到享尽天年，由后人处理房产时折还贷款。

1000 老人仅 17 张床位 养老产业亟待提速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说，虽然近几年我国养老机构建设与发展全面提速，但相对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的需求来讲，仍显得严重不足。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我国有各类养老机构 38060 个，拥有床位 266.2 万张，收养各类人员 210.9 万人。但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 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5%至 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2%至 3%的水平。也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平均 1000 名老人仅拥有 17 张床位。

我国 60 岁以上空巢老人数量及比例逐年增加，并出现了空巢期提前、失能问题凸显等特征，从而使得我国养老产业面临重重压力。许多专家建议，我国应构建应对老龄化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全面加强社会保障及养老机构建设，甚至应将养老产业提升至国家层面加以统筹安排。

半数老人守空巢

“日子越过越憋闷。”家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新华社区 71 岁的陈颖慈老人说，由于子女不在身边，她和老伴一直过着空巢生活，每天除了做饭就是看电视，没有外人聊天。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其中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 39 万人中老年人超过 6 万，“养老”正在成为社会突出问题。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现人口生育高峰，同时从 30 多年前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的父母相继步入老年，是形成空巢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城乡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高龄人口数量增长，使老年人家庭空巢期延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使空巢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居住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使越来越多的两代人愿意分开居住。这些现象，均导致老年化、空巢化加剧。

子女大多很苦恼

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人，如今已陆续到了“知天命”年纪。对于其中很多人来说，他们一边要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也开始考虑着自己的养老问题。

今年 48 岁的刘振清在吉林省长春市一家汽车公司上班，作为公司生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每月薪水不低，是很多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然而，一谈起养老问题，他就大倒苦水。他的父亲已去世，70 多岁的母亲患有脑血栓，行动不方便，只能请家庭保姆照顾。他一周去看望母亲一次。

“我估计我老了以后，还不如我妈呢！”刘振清说。前几年，他唯一的儿子去了澳大利亚读书，眼看着快要毕业了，孩子却希望留在国外工作。尽管十分不情愿，刘振清最后还是尊重儿子的选择，“希望儿子将来有个更好的发展”。说到以后，他表示压力很大。一来母亲年龄不断增高；二来自己的养老也摆上日程，到时谁来照顾自己，这让刘振清十分无奈和苦恼。

渐已成为社会各行业中坚力量的“70后”，工作压力大、日常应酬多，有空照顾老人变成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

家住山东省济南市的李锐在政府机关工作，36岁的他已经当上科长，虽然官职不大，但属于着重培养的后备干部。李锐说，每天的工作就一个字——忙，“白加黑、五加二”是常事。

李锐的父母也在济南，已经退休在家。尽管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但李锐很少有机会回家。除了白天忙不完的工作，晚上一般都有应酬。妻子除了上班，还得照顾11岁的儿子，也很难挤出自己的时间。“前不久我妈生病住院，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都是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就抽时间去过两次”，李锐说。看到父母日渐苍老，平常在家也没事可干，他也想回家多陪陪他们，但总是被工作打断，“过几年父母身体不好了，需要人照顾时，日子肯定更累”。

刚刚步入社会开始打拼的“80后”，面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和竞争激烈的工作，同样有许多苦恼。对于父母养老问题，“囊中羞涩”的他们甚至发出了“十年后，我的父母谁来养”的感慨。

今年28岁的刘昭已经在海南省海口市的一家企业工作了四年，现在每月工资在4500左右，年终还有1万元的奖金。应该说，这在当地算一个不错的工作。去年，准备结婚的刘昭贷款买了一套8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日子一下子就过得紧巴了”，刘昭说。为了这套房子，父母把这些年的积蓄基本都给他用作首付了，而刘昭也把这几年的积攒用了大半。今年6月房子交钥匙后，刘昭又开始忙起装修，等搬进去，他的银行卡上还剩几千块钱。

说起父母以后的养老问题，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的刘昭显得有些沮丧，“父母养老的钱都给我买房了，我的钱刚刚够用，以后结婚有了孩子，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想想以后，真觉得对不起父母。”

机构养老“短板”多

面对急速增长的老年人群，我国养老机构正在经受着床位偏紧、服务内容单一、运营效益低、护理人员短缺等“短板”的制约。不少干部群众认为，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

免税费、给予补贴、提供免费职业培训等措施，来吸引民间资本“入市”，带动机构养老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表示，入住养老院的一些老人不仅需要一般的护理，还需要一些特殊照料。然而我国大部分养老机构没有与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机制，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同时，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缺乏专业护理培训，多数服务人员只能做一些端茶、送饭、洗衣、做卫生等简单服务，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民营养老机构保本经营甚至负债累累，只能在低收费标准、低工资标准、低服务条件的“三低”状态下维持度日，靠自身积累根本无力再改善现有条件、扩大规模。

不少养老机构负责人向记者反映，现在护工难招，因为老人24小时都要陪护，特别是对不能自理老人要喂饭、翻身、帮助大小便，这样的活一般人干不了。另外，护理人员多为“40”“50”人员、下岗失业人员，且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技能结构偏低等现象普遍存在。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机构养老未来应走“民资为主、政府托底”路子。山东省老年学会理事张学强认为，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兴建养老机构有三大弊端：首先，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需兴建大量养老机构，投资巨大难以负担；其次，需由中央和地方供养大量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大财政负担；再次，由于不以盈利为目的，公办养老机构可能服务质量、运行效率等方面均较低。西北大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韩养民也认为，政府兴建的公办养老机构更多要发挥“托底”功能，以收养“三无”、“五保”、低收入和失能老年人等民营养老机构不愿收养的老人为主，让这些最弱势的老人也能安度晚年。

（2012年07月27日经济参考报）

“入狱养老”，触痛社会保障底线

这是一则令人心酸的新闻。湖南农村老汉付达信四年前在北京站广场持刀抢劫，被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判处二年有期徒刑。与其他人不同，进了看守所的付达信“喜上眉梢”，因为他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过上了“牢有所养”的生活。这则新闻让中国养老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

农村老人更易陷入老无所依困境

打着“入狱养老”主意的人并不单单付达信一个人，记者翻阅以往报道发现，2006年11月9日，71岁的流浪汉李召坤因故意纵火向广东中山警方自首，他这样交代自己的犯罪动机：“我曾听说放火烧山可以坐牢，而坐牢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流浪。”

“类似付达信这样的农村老人，居于社会最底层，失去劳动能力，既没有自主养老的基础，又缺乏社会保障，极易陷入老无所依的困境。”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入狱养老”的行为虽然有些极端，但放到大的社会背景来看，这无疑给中国的养老难题敲了一记警钟。秦希燕认为，“入狱养老”现象的发生与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力度不大、社会关注度不高等问题息息相关。

秦希燕进一步分析说，目前，我国老年立法不够完善。除了一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外，对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都还缺乏配套的法律规定；城镇、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大、农村应保未保和供养水平低的问题依然存在。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卫生保健、健康教育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体系没有真正建立；农村养老服务专业人员队伍缺失。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现有人员配置少，难以保证老人对养老提出的服务需求。

老年人社会保障更需要扶持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今年7月10日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农村养老保障覆盖率只有34.6%，月均养老金74元，仅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1527元)的近5%。农村老人目前主要还是靠家庭和土地养老，养老保障只占到18.7%。

对此，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我国老年人的保障和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尤其是部分农村人，他们年轻时靠从事农业劳动、打工等维持生计，一旦年纪大了，容易入不敷出。

“国家应保障每一位公民有尊严地养老，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付达信。”秦希燕建议完善相关养老的法律制度。构建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均等化，不断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健全和完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体系，大力推广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全面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基层专业法律服务的投入。在基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加入大量法律专业人才，进行法律普及、权益保护。建立适应老年人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包括社会福利、老年人医院、老年大学等。另外，要把老年福利事业作为朝阳产业加以扶持，增加资金投入，加强老年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等。

在法律层面保障老有所依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如何使老有所养、老有所归、老有所乐，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必须有法律保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指出。

朱景文说，我国正在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所确定的基本养老框架是：“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所谓以居家为基础，主要解决家庭赡养和抚养问题；社区为依托，主要解决社区养老问题；机构为支撑，主要解决政府养老服务的责任问题。

朱景文认为，所谓“父母在，不远游”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以居家为基础，对于像付达信这样的五保户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且也应该看到，面对强烈的竞争压力，即使是有家庭的老人，把养老的主要负担都加在子女身上，也是不现实的。从该案所揭示的现状出发，现在尤其应强调发挥社区和政府部门在养老方面的重要作用。

“没有物质保证，老有所归就是一句空话。”朱景文说，法律层面要做的就是使所有这些物质保障能够得到落实，而不是克扣。国家或有关社保机构可以规定最低限度的养老标准，生活费用起码不得低于在押人员的标准，对养老费用的支出要有严格的监督，“还必须指出，养老绝不仅仅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要让老人做到‘宾至如归’，这就要求养老机构要设身处地地考虑老人的实际需要”。（2012年08月13日 [检察日报](#)）

外国人如何养老

中国人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观念，让子女养老送终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也是老人幸福的标志。现在时代变了，老人的思想开放了，养老方式也在不断变化。我们一起来看看国外老人是怎样做的。

土耳其老人：“悠然见南山”

土耳其人退休后最大的心愿就是离开城市的喧嚣，搬到郊区或是乡村，回归田园生活。如今，这种想法代表了一大批土耳其老年人的心声。

很多土耳其老人一般在退休前会把养老地点选好，位于土耳其南方的郊区和乡村很受欢迎，因为南方的气候相对于北方来说，要更温暖、更潮湿。

回归田园除了爱它的宁静和悠闲外，还可亲自种自己喜欢吃的蔬菜，饲养鸡鸭。而这种传统的饮食方式也给土耳其老人带来许多健康的益处，如强健心脑血管、预防癌症等等。回归田园后，吃得天然健康，呼吸清新的空气，使部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加拿大老人：健身，我快乐

在加拿大，笑得最开心的是老人，穿得最漂亮、最绅士的是老人，最受社会尊敬和爱护的还是老人。加拿大老人大都喜欢“以静为乐”，到图书馆去看书，或修剪、浇灌自家庭院的花草，或到咖啡馆坐坐，享受那里的清雅与安静。

老年人平时还有一项最大的爱好就是健身。加拿大土地辽阔，首都渥太华就是一座花园城市，到处提供了让人们跑步、骑车、健身的专用道。而冬天，冰雪覆盖的加拿大，人们则更热衷于室内冰球、室外滑雪、溜冰等运动。

老人们运动也很讲究行头，比如专用的跑步衣、跑步鞋，专用的运动水壶；骑车则是专用的健身自行车，还戴着头盔。他们大都喜欢结伴一起健身，健身结束后一起去喝杯咖啡，吃点点心，开心地说笑一番再离去。

德国老人：“让我们同居吧”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近几年来德国的老年朋友们开创了一种新的养老方式。单身的老人们结伴而居。这样既可以相互照顾，结伴游玩，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又可以节省费用。

报道说，在德国名城德累斯顿，有一栋翻修一新的8层小楼“室友之家”，6位老年朋友同住这里已一年多了，他们中有5位女士和1位先生。其中一位是安妮塔·施密特女士，她老伴3年前突然去世后，为了避免过度伤心，她打算搬离原来的家。她与相识了60年的朋友赖斯曼一起看了“室友之家”的房子和环境，然后便一起搬了进来。搬到这里后，大家互相关心，她也不再觉得孤单。这些老人至少一个星期在公共厨房和起居室共进一次正餐，他们还一起出去游玩，一块上剧院。一旦有人生病或是受伤，其他人很快就会提供帮助。

美国的养老责任由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方面共同承担。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在职人员把工资所得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税”（社保税）上交给政府，用于发放给已退休者、残疾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在职者退休之后便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中享有相应的福利。在职人员退休后获得社会保障福利（社保福利）的多少视其工作时间长短、缴纳社保税数额以及退休年龄而定。但提前退休者的福利额将适当扣减。

除了社会保障制度，美国政府和一些公司还建有自己的退休金制度。美国政府制定了“联邦雇员退休制度”。政府工作人员除参加社会保障制度、缴纳社保税之外，还必须每月上缴工资收入的1.3%，政府工作人员退休后可根据其退休时的薪水、工龄长短等领取相应的退休金。

瑞士养老保险有三大支柱

瑞士的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分担、互为补充的三支柱模式上。

瑞士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一支柱是由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保险，其全称为“养老、遗属和伤残保险”。这是一种强制性保险。瑞士相关保险法规定，在职人员从17岁生日后的第一个月1日起开始支付养老、遗属和伤残保险金。支付方式是由雇主和雇员各支付50%。第二支柱是由企业提供的“职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是各种形式的个人养老保险，这是对第一和第二支柱的补充，以满足个人的特殊需要。

美国：“家园共享”结伴养老

对于那些在意老迈亲人独居的迁居者来说，一项叫“家庭共享”的社区倡议可能帮助他们得到慰藉。芝加哥老龄化办公室在早些年就推出了“家园共享”计划：将60岁及以上，年龄段相仿，又有兴趣共享一个家的个人以合得来为前提进行甄选和配对。由四个社会服务机构合作此项目，计划在第一年里配对成功30对。发言人米切尔认为：尤其是针对人群当中的老年阶层，这不失为一个既能建立友谊又能减少家庭开支的好办法。

埃文斯顿居民丹·布什，74岁，半退休状态的投资经纪人，对“家园共享”计划深信不疑。三年来，他一直与另一个离婚的男人共同住在他那12个房间的风房子里。他俩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认识。虽然布什很健康、积极，但他仍为生活里有个伴而感到高兴。还有，他一年节省了大约3,000元的公用经费。“当时，对方刚刚离婚，正找新地方住，而我有一座空间很大的房子，我俩一起共享这房子，并共同负担维护房子的开销，”布什说，“我的三个孩子也特别喜欢这个主意，家里多个伴，不仅让他们对我放心，我自己也觉得温馨许多。”

日本：“黄金”社区养老

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即著名的“黄金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与完善与老人相关的各种设施。以此为契机，各种老年公寓、老人活动室、老人医院更多的开始出现。

1994年黄金计划被重新修订，更名为“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英国：异地养老

英国有不少老年人把自己的养老地点选择到西班牙、南非等国家。这些国家物价水平较低，英国老人把本国的住宅出售后可在西班牙或南非买到面积更大或质量更好的住宅，享受到比本国更好的生活和服务。

新加坡：以房养老

新加坡是实施住房养老模式比较成功的一个国家。退休者将自己的住房抵押金给金融机构，按月从该金融机构获得现金收入，退休者仍居住在自己的住房内。（公益时报）

● 国是论衡

中国患上苏联病 必须对此有高度警觉

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紧要关头。

本月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7.6%，创三年新低，尽管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真实性一直不乏外界质疑，但这一“破八”的数据及其背后经济放缓的趋势却无人质疑。

事实上，仅从有限的经济现象中也可预知这一切，如为抑制房价上涨而采取的限购措施、为降低通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商品出口遭遇欧美经济疲软等等，但问题是，中国经济到底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

从今年 3 月起，中国实施新的统计制度，即由被统计对象直接向国家统计中心上报数据的改革，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随后也指出，仍有个别基层政府机构干预企业独立上报统计数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中国经济数据造假的问题将误导西方国家政府和金融界做出的决策。

在经济运行宏观数据缺位的背景下，再通过能源消耗和主要工业行业的运行指标，我们依然可以摸出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脉动，同时也能通过能源消耗的结构来寻找到中国经济的病痛。

煤矿市场的动向

从产业结构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截至 2011 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达到 47%和 43%。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第三产业比例增长缓慢（从 40%增加到 43%），这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层次相对落后，转变过程较慢。同时，中国工业的电力消耗巨大。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按照产业分类核算，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总额的 74%（去年同期达到 75.3%）。

在中国经济结构清晰的框架下，为了评测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早有一些更加专业的机构自行编制中国经济增长指数，其数据来源包括发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房地产开工面积等。这些行业数据同国民经济紧密相关，受政治因素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

中国发电主要依靠煤炭。尽管煤炭拥有前期投资费用较小、不受季节因素影响等优点，但也存在燃烧效率较低、污染大等劣势。由于中国煤炭储量大、成本较低，其他化石燃料开采量相对较小，煤炭成为中国发电的主力。目前，我国煤电装机占发电总装机容量的74%。燃煤电厂每年要消耗原煤约14亿吨。

从煤矿市场的动向来看，中国的发电量相对更加准确。首先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高达70%，煤炭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比天然气对俄罗斯、石油对美国（均为40%左右）的意义更为重要。其次，介于发电量和经济运行之间的敏感关联，官方公布的发电量数据的真实性也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相比电力市场的垄断而言，处于上游的煤炭市场化程度更高，相关数据也更加透明和准确。

今年以来，国内煤炭价格下跌和秦皇岛港煤炭积压已经不是新闻。上半年以来，动力煤的价格已下跌了大约30%，秦皇岛港的煤炭库存已经接近900万吨，超过了800万吨的警戒水平，这是2008年秋天经济危机最严重时也不曾出现过的。

煤价的下跌，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价格倒挂引起的进口大增（事实上，这部分比例在中国煤炭能源消耗的比例中依然很低），另一方面是因为价格高涨下产能急剧扩张的结果。归结到一点，煤炭大客户——发电厂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出现与煤炭开采相对应的增长，煤炭市场明显供过于求。

由于煤炭开采地区和消费地区的差异，中国一直存在西煤东送的区域调运问题。煤炭运输和铁路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煤炭运输方式上，铁路占到70%以上；而在铁路货运分类中，煤炭的比例达到一半以上，铁路运煤紧张的情况曾出现过多次。

但今年以来，铁路运输同样萧条。铁道部称，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上半年全路货源减少，加上受施工、天气和设备故障等因素影响，全路货运形势严峻，全国铁路货运量增幅仅2.5%。铁道部7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全国铁路货运总发送量完成3.13亿吨，较5月环比下降8.48%。铁道部称，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煤炭、冶炼等铁路主要货源明显减少。6月全国铁路煤炭运量完成1.76亿吨，环比降幅超过一成。

尽管，今年上半年南方雨水丰沛使得中国电力结构中第二大的水电部分有所增加，但依然难以掩饰中国发电量的总体下降。从中国五大发电的财报来看，也能看到这些迹象，例如最大的华能集团在中国境内各运行电厂的发电量减少了1.46%，售电量减少了1.45%。大唐集团的发电量有所增长，也仅为1.5%，国投电力(600886, 股吧)的发电量则减少了4.77%。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发电量数据依然显示，上半年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3.7%。

“煤炭经济”的硬伤

我们需要思考一下“煤炭经济”背后的脆弱。事实上，“煤炭经济”有两大弱点，第一，效率奇低；第二，经济结构简单，容易导致国家成为投资拉动型的经济体。

首先看效率，在热能转换方面，同石油和天然气相比，煤炭是效率较低的化石燃料。而在中国，由于技术设备和管理落后，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以燃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而煤炭对中国碳排放的贡献高达70%以上。

无论是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报告，还是英国石油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均认为，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尽管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和能源主管部门曾对这一情况加以否认，但毫无争议的是，过度依赖煤炭已经造成了我国畸形的能源消费结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煤炭这一能源产品本身的低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体整体性的低效。

其次，以煤炭为主的经济往往是简单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上看，都经历了以“煤炭-钢铁”为核心的工业发展初级阶段，但在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这种模式会逐渐被淘汰，转向使用效率更高的燃料，生产更加高端的核心产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对于这种扩张性的，以煤炭和钢铁消耗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历史上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苏联就是前车之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步入了迅速增长的阶段。西方和苏联官方统计都证明，从那时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一直在突飞猛进。但在这之后，苏联经济戏剧性地陷入了停滞。按照美国的看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缺陷，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在技术创新方面的速度放缓，未能从电子和计算机所带来的通信信息浪潮中获益，而恰恰是后者迅速的改变了西方经济。

但俄罗斯人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苏联未能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将煤炭经济及时转变成石油经济。首先，石油作为燃料的燃烧效率高于煤炭。其次，作为一种多用途的原料，石油产品的加工和使用能够更加广泛的促进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发展，比如交通、汽车、化工、冶金乃至农业。最终，美国的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使经济出现了良性的循环增长。

在煤炭经济下，苏联政府将大量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了军事工业之中，而决定武器生产规模的并非是军事需求，而是其生产能力。按照盖达尔的数据，70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19倍。苏军装备的坦克数量多达6万辆，超过美国及其盟国所拥有数量的许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延误了加工业和民用工业部门的发展。

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中国的基础建设对钢材、水泥和劳动力的巨大消耗，以及所形成的产能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过去十年里（特别是 2008 年经济刺激措施实施后）中国对基础建设投资巨大，虽然这改善了部分贫困地区交通条件，但大部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今年二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7.6%，创三年新低，尽管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真实性一直不乏外界质疑，但这一“破八”的数据及其背后经济放缓的趋势却无人质疑。事实上，仅从有限的经济现象中也可预知这一切，...

一些持反对意见的观察人士认为，出租土地的地区可能会在土地周边出现某些封闭性的“民族飞地”（编者注：指在一块某个民族占主要成份的地区中的某一小块土地上，聚居的却是另一个民族），而被长期“掠夺式经营”后的土地可能会丧失肥力并难以恢复，继而引起原居民的撤离，甚至不排除一些外国移民侵占土地。

俄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问题研究中心专家鲍里斯·弗鲁姆金认为这一建议是自相矛盾的，并且有可能激化潜在的冲突，这有可能致使在属于俄罗斯的土地上出现“技术上的或者民族上的飞地”。他认为，更安全可行的方式是俄罗斯与越南或韩国一起创建合资公司。

“发展”研究中心分析师谢尔盖·尚德宾说，如果把这些土地长期租给外国人，这些土地可能会被掠夺式经营，过多地施用农药和化肥，使土壤遭受严重污染，而重新恢复土壤的肥力将是非常困难的。他表示，如果一些土地因为滥用农药和化肥而不能继续使用，并被废弃，有可能继而引起当地原住民迁移。同时不排除一些外国人在俄罗斯耕作多年后，就想永久定居在这些土地上。

这份计划将由俄经济发展部提交给联邦政府，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重要建议之一。今年 9 月，俄罗斯将在远东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峰会。如果这份建议最终被联邦政府采纳，那么该计划可能在峰会期间由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宣布，表示俄罗斯愿意为稳定世界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最大的风险在俄方政策不稳定

在李卫明看来，俄罗斯地方官员也希望中国农民去种地，因为他们的土地荒着也是荒着，而中国农民种完地后东西都留在了俄罗斯，“何乐而不为呢？”

在俄罗斯租种土地的黑龙江宝清县宝清镇农民栾宝富介绍，在俄罗斯种地，农资价格要贵些，但承包土地价格便宜些，总体来说，种植成本要比国内稍低些。此外，俄罗斯国内的农产品价格要低于国内，但是农民囿于运费和边境关税，所以一般不会把粮食运回国，而是就地销售。“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政策可能会更好。”他说。

不过，去俄罗斯种地，也不是没有风险，李卫明介绍，最大的问题还是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农民赴俄种地时间长，但是俄方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如中方与俄方集体农庄或政府签协议后会出现反复甚至毁约。一些其他势力的俄罗斯人到农场找麻烦，甚至会直接把农民撵走。”

这也是乌云镇农民的感受，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相对缺乏法律保护或缺乏维权渠道，地方政府牵头成立公司虽然能够解决农民的一些顾虑，但由于签证难等问题，农民大多还是抱着“干一年算一年”的心态。

此外，目前在俄开发农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面临来自韩国、日本企业的竞争，市场形势不再如前些年那般一帆风顺，也导致了俄罗斯在劳务签证政策上的摇摆与徘徊。李卫明说：“我们今年还没有申请到一个劳务签证，现在只能申请商务签证。”

俄罗斯国内学者对这项土地政策的矛盾现也基于此：一方面，俄政府希望发展远东但依靠自身财力无法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和振兴。另一方面，俄罗斯对外国资本和劳动力怀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担心涌入过多的外国人而致使该地区被外国移民“异化”，所以对中国人也保持着戒心。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认为，俄罗斯大的方向和战略是确定的，远东的开发不仅有经济目的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俄罗斯需要在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安全两个问题上寻找平衡点，这实际也是由俄罗斯的心态决定，心态决定远东地区的未来。”冯玉军认为，俄罗斯担心与远东地区的联系减弱，如果外资涌入过快，这些地区对俄罗斯的离心率可能会越来越远。但对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防范的问题，而是要将土地出租纳入法律范围之内，吸引投资促进开发实际不存在安全问题。（2012-07-29 经济观察报）

●政坛经纬

纽约时报：解读中国省级党委换届

2012年7月3日，新一届北京市委常委班子产生。至此，在2011年10月至11月、2012年4月至7月两个时间段，中共分阶段在31个省份完成省级党委换届。这意味着中共十八大之前的省级党委常委布局告一段落。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共产生常委 404 人（次），新疆、西藏各 15 人，青海 14 人，辽宁等 24 省份各 13 人，海南、陕西、四川、上海各 12 人；其中王三运在安徽、甘肃，尹德明在西藏、天津均曾分别当选常委。

各省份党委换届后，中央曾调整了河南、安徽、江西、内蒙古、西藏、湖南个别常委。截至目前，河南、内蒙古常委各缺额一名，现任省级省委常委实有 402 人。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中共干部政策的指导方针，选拔任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讲究来自“五湖四海”，注重选拔女性干部，并重视发挥共青团的“后备军”作用。本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果体现了上述因素。

与五年前的上一轮省级党委换届相比，现任省级省委常委的年龄段分布呈现“40 后”逐步淡出、“50 后”已成主导、“60 后”异军突起的特点。

财新记者统计，现任省级省委常委仅有“40 后”8 人，占 1.99%；“50 后”277 人，占 68.91%，从而在中国省级政要中占据绝对优势；“60 后”117 人，占 29.10%。

其中最年长的是出生于 1945 年 4 月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最年轻的是出生于 1968 年 7 月的福州市委书记杨岳，前者是 17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上一轮换届后，“60 后”省级省委常委数量剧增，从 34 人增长到 117 人，增幅达三倍多；分布的省份也从原来的 24 个扩展到目前的所有省份。现任“60 后”省级省委常委最多的是新疆、西藏和贵州，各有七人；其次是内蒙古、安徽、黑龙江，各有六人；山西、吉林、宁夏各有五人，位居第三。

从我国地区分布看，东、中、西部“60 后”省级常委的数量分别是 35、32、50，明显体现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特点。

有六位“60 后”担任省级党政一把手。他们分别是内蒙古的胡春华、吉林的孙政才、湖南的周强，以及新疆的努尔·白克力、福建的苏树林、河北的张庆伟。在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中，“60 后”达 8 人之多；其中河北、福建两省的所有省委副书记均是“60 后”。

不过与上一轮换届相比，本次省级党委换届“干部年轻化”的说法值得商榷。据财新记者统计，仅有安徽、内蒙古、河北三省份常委的平均年龄有所降低，其余 28 省份常委平均年龄均有所升高；其中辽宁平均年龄最大，河北和新疆平均年龄最小。

“知识化”和“专业化”集中体现在“博士常委”群体的涌现。

财新记者统计，“博士常委”有 100 位，占现任省级省委常委总数的 24.88%。这意味着几乎每四位省级省委常委中就有一位“博士常委”。

其中，天津有七位排名居首，其次是山西有六位，而河北、陕西、甘肃则分别以五位“博士常委”排名第三。若按照地区分布，东、中、西部分别有“博士常委”32、30、38人，分布较为均衡。

百位“博士常委”所学专业学科呈多元化分布趋势。财新记者统计，共有经济学博士32位，管理学博士27位，法学博士15位，工学博士13位，哲学博士和农学博士各三位，教育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各两位，理学博士和荣誉博士各一位；其中山西省纪委书记李兆前是唯一的工学和管理学“双博士”。

此外，六位省级省委常委曾在任领导职务时有博士后研究经历，分别是：山西的袁纯清、江西的姚亚平、贵州的李军、重庆的翁杰明、河北的赵勇和聂辰席。

百位“博士常委”中包括十名正省级高官，分别是辽宁、山西、广西、吉林4省（区）委书记和云南、安徽、浙江、宁夏、青海、天津六省份行政一把手；其余90位为副省级高官。

“博士常委”的性别比呈现“阳盛阴衰”的特点：有男性92人，女性8人；从年龄段看，“50后”62人，远远多于“60后”的38人。

少数“博士常委”在从政前完成了博士学习。如新疆的熊选国师从刑法学权威马克昌，博士毕业后入最高法院并升至副院长。

与之类似的还有辽宁的王珉、江西的尚勇、广东的王荣、湖南的陈肇雄、辽宁的夏德仁、山西的李兆前、福建的杨岳、新疆的黄卫、海南的李秀领、吉林的孙政才、江西的姚亚平等。

但更多“博士常委”在任领导职务时获博士头衔。财新记者统计，百位“博士常委”中有78人在任政学商界职务时获博士学位，有10人读博时不任任何领导职务，另有12人读博时任职情况不详。

如青海的骆惠宁在任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青海省委副书记期间，先后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用时仅三年七个月。

获博士学位较快的是河北的梁滨和江西的史文清。前者获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耗时一年九个月；后者获西安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历时两年三个月。

甘肃的虞海燕攻读东北大学材料所材料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历时八年四个月；江苏的李小敏从2002年9月起攻读南京大学城市发展战略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至今已九年多。

博士头衔的获得与官员短时间内的升迁有统计学上的正相关。财新记者统计，在完成读博的一年内，袁纯清等33人被安排到更加重要的岗位，李秀领、姚亚平则很快告别学院而走上仕途，占百名“博士常委”的35%。

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从事学术的人中，王珉六年后任南京航空学院副校长，又四年多后任江苏省省长助理，从而踏上政坛；尚勇、陈肇雄、夏德仁、李兆前、黄卫、孙政才、王荣、柯尊平、朱丽萍等人也走过了大同小异的“学而优则仕”之路。

在本省或临近省份攻读博士，成为不少“博士常委”的选择。如吉林的马俊清、金振吉、高广滨和曾任吉林省委常委的李斌，都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河北的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博士学位均来自天津大学。

本轮省级党委换届结束后，共有 37 位“巾帼常委”，占现任省级党委常委的 9.20%。其中江苏女常委有三人之多，其次是安徽、辽宁、福建、贵州、甘肃各有两人，山东等 24 省份各有一人。由于原党委常委崔玉英调离，西藏成为目前唯一没有“巾帼常委”的省份。

37 位“巾帼常委”中，福建的孙春兰是省委书记，安徽的李斌是省长，两人也分别是现任唯一的女性省级党政一把手；上海的殷一璀已任三届市委副书记，重庆的张轩则是首次连任市委副书记。

在其他担任省级党委常委的女性中，江西的舒晓琴是唯一的女性省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厅厅长；天津的朱丽萍是市教育工委书记；还有两位是省委秘书长，两位是地级市市委书记，三位为省委组织部长，三位是省级工会主席，五位是纪委书记，五位是宣传部长，六位是统战部长，七位是省级政府副职。

其中，贵州省常务副省长谌贻琴兼任省委宣传部长，海南省纪委书记马永霞兼任省检察院检察长，湖北省副省长张岱梨兼任省委统战部长。

402 名省级党委常委来自全国 31 个省份，体现出干部任用的“五湖四海”原则；与此同时，干部储备的地区差别呈明显的阶梯状分布。

从省委常委们的籍贯分布看，走出 10 位以上省委常委的有 14 个省份，分别是山东、河北、江苏、浙江、河南、湖北、辽宁、安徽、湖南、陕西、山西、四川、福建和云南。其中前七省籍省委常委即达 204 人，超过全部常委的一半。

22 个省份中有来自山东籍的常委 53 人。这一数字比排名最后十位的北京、天津、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上海、海南、甘肃、西藏籍常委总和还要多 7 人。排名次席的是河北，有 30 人分布于 16 省份；第三位是江苏，有 29 人分布于 19 省份。

本省籍常委在各自省份常委班子中占多数的，有北京、重庆、江苏、安徽、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山西、辽宁、吉林、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内蒙古、新疆、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 23 省份；其中山东以 9 人、山西以 7 人占据绝对多数。

据财新记者统计，来自东、中、西部地区的省级省委常委分别有 195、122、85 人。这说明干部储备培养的地区差别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别大致暗合。

在 402 位省级省委常委中，有 168 人曾有各级共青团工作经历，占 41.79%。其中七人担任所在省份党政一把手。他们是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内蒙古单位书记胡春华和山东省长姜大明。

在各省份有共青团系统任职经历的省委常委中，贵州九人最多，其次是广东和天津各有八人，排在第三位的是山东和陕西各有七人。按照地区分布，东、中、西部分别有 63、44、61 位省级省委常委曾任职于各级共青团系统，分布较为均衡。

其中，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以上职务者有 14 人，而且其年龄分布较为平均，有“50 后”6 人，“60 后”8 人。

按照以往惯例，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后，会有一些省份党政高官调整职务。这意味着目前的省级党委领导班子，仍有可能会在十八大之后进行一定规模的调整。

●人物春秋

被故乡“吃掉”的沈从文

今年是沈从文先生诞辰 110 周年，他如果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笔下那个想象出来的“湘西”，已经消失了，故乡藉着他的大名荷包渐鼓，而他却好像永远失去了故乡。

沈从文家人不愿为了纪念沈从文而毁掉凤凰，但凤凰已经被逐利的商业旅游摧毁了。灯红酒绿，喧嚣浮躁。蹩脚的仿古建筑破坏了小城的视线，人造的繁华遮蔽了历史，伪民俗大放光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铜臭味的闹市。那个“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世外桃源”，已变得难以辨认。

对沈从文的再认识却要开始了。最新出版的以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口述为主体的《沈从文家事》，将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

在 1949 年，他曾因新政权的打压，自杀两次。1949 年 5 月 30 日，沈从文写道：“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沈龙朱“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觉得不对头：‘啊？是要中电的呀！’”几天后，沈从文用锋利的刀片把手腕脖子都割了，家人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把他送进北郊精神病医院。

在“文革”中，沈从文一家从三间房缩为二间房，最后只剩下一间房。

妻子和两个儿子是在沈从文离世数年后，在整理其遗作和日记后才逐步理解了他。沈从文由思而信，家人却只是信。

生前寂寞，死后荣耀

故乡派人下跪请回了沈从文的骨灰，想做成墓园供人凭吊。其实也很想获取经济效益，仅仅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坚决反对，才未能把墓园变成收费景点。沈龙朱他们制止了县政府一次次扩建墓园的冲动，却阻止不了当地人的盖房狂潮，沈虎雏说，“违章建筑一直逼近墓地，堵着墓地的进口，全都盖满了，而且高度把从墓地往外的视野都挡住了。”沈龙朱说，“墓地跟城区之间，原来很好的沅河自然风光全没了，变成两边全是房子非常狭窄的一条小过道。”

“故居陈列室里，一张张清晰珍贵的图片，记录了沈从文步入尘世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那一行行流畅深沉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了作家成长的过程。檀木方桌，藤编靠椅、古老的木质结构架子床，都是沈老当年使用过的实物。目睹这些实物，眼前似乎出现了沈老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聆听沈老的教诲：‘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当地旅游网如此介绍，但事实是，由沈家旧屋翻新的故居，不过是一个假古董，家具摆设都是向当地人征集的，跟沈从文没有一丝关系。即便如此，故居也被列入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已经承包给他人了，租期五十年。凤凰县城旅游通票 168 元，沈从文故居是“最耀眼”的景点。

到凤凰为父母扫墓，沈龙朱和沈虎雏兄弟俩不愿迈进那地方。

更离奇的是，沈从文创造的“边城”沦为当地政府的摇钱树。“边城”原名茶峒，茶，汉人也，此地是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地处三省交界，乃湘西名镇。一心求进步的地方官，将茶峒镇更名为“边城镇”，坐实了沈从文的想象。他们还请一百个书法家书写六万字的《边城》全文，雇人刻在岩石上。最让人侧目的是，他们请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设计了一个宏大“翠翠岛”主题公园，岛上耸立着巨大的“翠翠”雕像，小说里那条著名的黄狗依偎在她身边，她在等待心上人归来。游船上挂着“翠翠笑迎天下客”的横幅，让人生出几分滑稽感。在自负的规划师眼里，《边城》里的人物地名皆可落地——“渡口岸坡上有一块坪地，说这里就是‘碧溪嘴’。坪地上绿草如茵，四周灌木丛生，近边还有几丛翠竹和两株大枫树。当地人说，当年翠翠和她的爷爷就住在这儿的一间木屋里。”“边城镇”网站如是介绍。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还找到了“翠翠”的原型。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一书里说，沈从文“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有多少真实性”，《边城》是记忆和想象在沈从文心里发酵的果实，属于美的抒情。沈从文书写的是对乡村文明解体的挽歌，是供自己追忆，让读者从功利社会里抬起头，眺望远方那个幻影似的真纯而美的生活，以此获得滋润。

沈从文遭受的误解在于，许多人仅仅视他为一个天才的美文作家，而忘记了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战士的事实。在介绍他思想精华的《中国人的病》出版后，情况有了微弱的改变。

故乡抓住了他的名字，却背叛了他。无道德底线的商业放肆地消费着人们对“边城”的渴望，这使他的作品真的成了一个想象乌托邦。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迅疾的毁灭中，无非是时间迟早而已。

创造了“边城”的作者，最后一次回家是在 1992 年，由妻子张兆和亲手将他的骨灰撒入沱江的流水中。他的墓碑上没有刻字，那块五彩石上写着他的警言：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链接：沈从文与《边城》

沈从文 20 世纪 20 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其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930 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 20 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中篇小说《边城》于 1934 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 30 多部短篇小说集和 6 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遵从古礼的美德、无欲无争的人生。作者向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厌恶所谓的现代文明，痛恨现实的黑暗，于是他在作品中构筑了一个理想世界，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的希望，表达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执著追求。《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是作者向往优美人性与人生的化身与极致。

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特别是这一人物在爱情生活中的态度，描绘出人世间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讴歌了象征爱与美的人性的人生，为人类的爱字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

●历史深处

“康乾盛世”时一个谣言如何引发国家级事件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中国多地经历了一场流言带来的短暂“盐荒”闹剧。回溯历史，流言曾经造成严重的国家级事件。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这年春天，江南发生了几起“叫魂”案。

江西小县德清，某人把仇家的姓名八字写在纸上请一个木匠用木桩打入水底而企图置仇家于死命。一些流浪汉偷剪别人的发梢或衣角，即做魔胜之用。这引起了乡民的恐慌，石匠、乞丐、游方僧等高度怀疑对象，或被扭送官府、或被扭打至死。

流言和恐慌传播的速度极快。6月，“叫魂”谣言已经越出长江扩散到了近千里外上游城市的汉阳府。至初秋蔓延到华北，再向西行进，于10月在陕西境内出现。在半年时间里，“叫魂”这个幽灵就盘桓在了大半个中国。

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君主弘历的敏感神经，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并一手策动了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3个月来，军机大臣们忠实地推动了对妖术的清剿。可是他们沮丧地发现，最后只剩下一大堆混淆不清的伪证，没有头绪的琐屑细节，以及许多不明不白毙命的囚犯。官僚集团开始怀疑妖党是否存在，军机处的介入，使得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妖术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嫉恨的一个幽灵？？至此，本书故事中最初出现的那些角色——既包括受害者也包括施害者——终于都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

故事讲完了，深思不能就此打住。美国汉学家孔飞力调度着卷帙浩繁的奏折、上谕、史料，条分缕析，织锦般还原了历史事件，并得出信息掌控与政治能力一致性的结论。这就是其口碑极高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对信息匮乏与失真的补救

大清帝国的根基，原来脆弱得经受不起一缕“叫魂”的风。江西德清一句坊间流言，被逐级放大后，竟然搅动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官场，各种行政常规，田赋、科举、河工、盐政、

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国家机器哗啦啦地开动起来，为其让路，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

将这缕风逐级放大的信息流通道有两个：一是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因商业需要而建立的几乎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二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

政府通讯体系所依存赖的组织，是典型的科层制。清朝基层的政权是州县，他们原则上是不能越级同皇帝直接对话的，省级以上的督抚拥有这种权利，也有义务向皇帝本身报告自己负责的地方的情况。

按照制度设置，他们的折子先交到军机处（秘书机构），军机大臣们在对报告做了初步的判断后，把他们认为重要的报告交给皇帝，通常也附上自己的处理意见，皇帝往往也就根据折子处理意见做出批复。从这个过程来看，显然，皇帝所能得到的，只是官僚希望他得到的信息。

乾隆很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在信息流通领域内的不利地位，并且采取了许多反措施来对付官僚们的颞顽甚至是有意的隐瞒。

皇帝掌控信息的途径又在常规渠道之外开辟机要渠道，即皇帝和各省长官之间的个人通讯热线。密折由具折人的私人仆从或驿吏秘密送到皇帝御前，不经过中间官僚。上折人是皇帝特许的部院大臣、封疆大吏和科道，后来放宽到道员以上。密折放在专用的折匣内，甚至加上西洋锁，钥匙皇帝和具折人各一把，他人不得开阅。

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的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驿路梨花纷飞，一骑绝尘，一只沉甸甸的木匣，里面装着这个国家最高机密。

这种体制外或半体制外的制度，以自己比较私人的方式直接获得信息或情报，从明朝开始实行内阁（即清之军机处）制度开始，便建立了起来。明朝更侧重于密探制度，即有名的东厂、西厂。清朝皇帝努力建立与地方大员的类似私人性质的“恩情”关系，并鼓励他们直接上“密折”，力图避开制度获得更可信的信息。

一旦升为省级官僚，便标志着他们同皇帝之间建立起了一种以忠诚和依靠为特征的特殊关系。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是一个由63人组成的很小的精英圈子，弘历通过朱批奏折操纵和牵引他的精英官吏。

千古胶着的信息控制与反控制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乾隆运用其

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从表面上看，皇帝处于科层制组织的最高层，又处在信息流通的中枢位置，他所掌握的信息应该比处在基层的官僚更全面、更准确。

恰恰相反。这个金字塔尖的位置恰恰使他处于被蒙蔽的位置。

一方面是君主企图通过控制信息来掌控官僚阶层和百姓；另一方面，官僚阶层通过截流信息来回避君主。在民众和最高统治者之间，信息的传递遇到了官僚阶层强有力的阻遏。

他们“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盖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一个普通的清代官僚即便并非故意设置障碍，仅以他日常的贪渎和欺饰，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君主大伤脑筋”。

地方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的一般原则是就事论事的，如果没有出人命，就大体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最初，官僚们是有意无意地不让皇帝本人知道有巫术事件在地方发生；而后，当皇帝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官僚们又极力让皇帝相信，这些事件是孤立的，地方性的；后来，当皇帝已经强势介入，官僚们仍然尽力地通过过滤信息引导皇帝做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判断。

在清政府的政治体系中，官僚不仅是贯彻皇帝意志的工具，也是皇帝获得他的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信息的根本渠道。他只有根据官僚们给他的信息来做出判断和决策。

君主通过常规考评制度、私人亲密的秘密奏报、恩典庇护和法律制裁等加强对官僚的控制，而官僚集团则借助信息的截流、转移视线、集团内统一步调、将事件导入到常规化的安全轨道等来进行反控制。这是一场千古胶着的信息战。（2011-08-08 16：凤凰网）